

■综述

朝鲜族“60后”作家的倾情书写

□郑风淑



——

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作家以“50后”、“60后”作家为中流砥柱,携手“30后”、“40后”、“70后”、“80后”作家,以饱含深情的创作,书写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的延边各族人民,以及生活在全国各地的朝鲜族、海外务工的朝鲜族人的多彩生活、命运浮沉,掀起了朝鲜族文学的持续繁荣。

在这个过程中,金哲、林元春、朴善锡、南永前、金应俊等“30后”、“40后”作家继续坚持创作。他们的辛勤劳动对朝鲜族文学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崔红一、许连顺、金勋、禹光勋、尹林浩、李惠善等“50后”作家佳作纷呈。金勋的小说集《京城里的“乡巴佬”》(2001年)、石华的诗集《延边》(2006年)、李惠善的长篇小说《生命》(2006年)、崔红一的长篇小说三部曲《龙井别曲》(2013—2015年)、许连顺的长篇小说《中国媳妇》(2015年)和《谁曾见过蝴蝶的家》(2015年)等,是其中较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

作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朝鲜族“60后”作家,顾名思义就是指1960年代出生,文学起步大多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作家。“60后”一代经历了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他们的视野相对宽广,精神、思维具备较好的均衡感。他们的文学是与中国改革开放至今活力四射的巨变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学。他们在20多岁最敏感的时候迎来改革开放时代,三十而立时被卷入市场经济大潮之中,该四十不惑了却迎来信息化时代,如今五十知天命了,正冷静地观察这个时代,然后继续创作新的作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曾经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中国社会市场化起步的大躁动,受市场经济的吸引,一些作家曾经弃文从商,但仍有很多人留在文学领域继续奋战。经过大浪淘沙,留下来的都是那些忠于文学、立志为文学献身的写作者。新世纪之后,随着散文体裁的大兴起,又有一批以散文创作为主的“60后”作家出现,其中也不乏那些大器晚成的优秀作家,主要是在八九十年代沉浮中坚守朝鲜族文学阵地的那些精英,或称狂热的文学信徒。

二

崔国哲是中国朝鲜族“60后”作家的代表之一,出生在南大村。他的童年和青年生活都是在乡村度过的。在凉水镇的南大村,他专心致志写作品,孜孜不倦地垒起了一座文字之塔。1987年,崔国哲25岁,在《天池》刊物上发表了处女作《乡村之光》,展露了一个小说家的才华。

“笋有多大,竹有多粗。钻出地面竹笋的粗

细,决定竹子一生的粗细。无论成长十年也好,二十年也罢,竹子虽然会长高,会变得坚实,但它的粗细依然如初,是刚刚钻出地面时的竹笋的粗细,一成不变”。这是崔国哲小说《春天的葬礼》的词句。后来,他以这部作品获得了《天池》文学奖、金达莱文学奖等4项文学奖,他的创作才能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

对于民族之根的不断探索和对朝鲜族社会现实的不断反思,以及对于朝鲜族生活现状的细致描绘,是崔国哲的小说所体现的主要内容和特色。因此,他的小说始终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乡土气息。《光复的后裔们》(2010年)是崔国哲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作品以朝鲜族小村庄“南大川”为背景,详细描绘了“光复”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及生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人们不同命运。作品可贵之处在于极为生动地再现了朝鲜族人民面对历史大变革,时代如何改变了个人命运的真实面貌。该作品所描写故事,正是中国朝鲜族史册中最真实的片段之一。

经过多年的辛勤努力,崔国哲创作了长篇小说3部,中短篇小说800余篇,散文100余篇,获得了各种文学奖20多次。

金革是朝鲜族“60后”作家的又一个代表,是朝鲜族文学界少见的多产作家。

金革对阅读充满热爱,称他为“读书狂”都不为过。阅读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多养分。他的阅读不止局限于文学,而且还涉猎哲学、艺术、历史、宗教、天文学、生物、民俗等领域,包罗万象。他购置、收藏了大量图书,其书房有15000多册的书籍和6000多份影像资料。此外,他还常年订阅了十多种期刊。

1985年,金革发表短篇小说《侏儒们》,由此步入人们的视野,随后又陆续发表了《诺亚方舟》(1985年)、《品酒》(1985年)等。从此,他的短篇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拾。1994年,金革发表中篇小说《迷茫的城市》《笛子》《银妆刀》等,后来又创作了一系列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中篇小说,如《天才》(1995年)、《人鱼的小提琴》(1996年)、《坠落的翅膀》(1998年)、《病毒》(2000年)、《祖母的传说》(2003年)、《火祭》(2005年)、《原罪》(2006年)、《热铁皮屋上的猫》(2008年)、《木马与淑女》(2009年)等。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累计有80多篇。

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文学创作离不开所处的时代,特别是诗歌,其灵感源泉与时代社会的变化密不可分。朴长吉是朝鲜族具有代表性的“60后”诗人之一。他正好处于1960年出生,其诗歌创作从1980年代起一直持续不断。迄今为止,他已出版《石磨》(2003年)、《短诗长叹》(2010年)、《抵达名为你的站点》(2016年)等多部诗

集。这些诗集留有时代的痕迹。比如,《石磨》凸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作特征,而《短诗长叹》《抵达名为你的站点》则带有新世纪以来的多元文化思潮。

三

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每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或文学观念都要由其相应时代的代表作家群来实现,来完成,无论是前代人还是后代人都无法替代。“60后”作家与“30后”、“40后”和“50后”作家有着不同的时代使命,他们必须更好地书写自己所生活的时代。

“60后”作家们关注的问题多种多样,比如民族历史轨迹与身份认同主题(如崔国哲的小说、金昌永的诗歌等),又如个人的不幸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代动荡的关系(如金革的小说),还有知识分子的懦弱与自尊(如韩永男的小说)等。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带来的价值观的突变与人生本质的异化也是这一代作家聚焦的重要主题。洪君植的冥想诗歌也是独具一格,而这种诗歌的主题往往与诗歌形式的不断创新相伴。

从创作风格上看,朝鲜族“60后”作家们大多个性鲜明,勇于创新,勇于开拓,经常涉猎多种文学体裁领域。韩永男和赵光明都是打破文学体裁边界的作家,是不甘寂寞的创新者。赵光明以小说创作起步,后来兼顾诗歌创作,最近几年又涉猎散文创作,在各个体裁领域都有建树。韩永男早期以诗歌创作为主,新世纪之后,在坚持诗歌创作之外,还创作发表了大量的小说,出版了小说集《小岛,岛边,边缘人》,还曾涉足散文、报告文学和评论的写作。金革在小说写作中试验各种手法、技巧,同时涉足传记、散文等其他体裁的创作。

朝鲜族“60后”作家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拓展着。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他们的力量逐渐增强,群体规模也不断壮大。除了金昌永、朴玉男等“60后”优秀新生力量的先后补充外,随着新世纪前后的散文体裁大爆发,一大批优秀散文作家的加盟,进一步壮大了朝鲜族“60后”作家群。徐永彬、崔顺姬、金顺姬、南福实、杨银姬、姜贞淑、徐贞顺等都是颇具实力的散文作家,其中女作家居多。

总之,朝鲜族“60后”作家群勇于担负起社会和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他们无愧于时代,也无愧于历史,以个性鲜明的创作风格,包罗万象的主题意识和勇于探索的创作精神,写出一系列优秀作品。在当前的朝鲜族文学界,除了“60后”作家,还有从“30后”到“00后”的数代作家在一起努力创作着。正因为他们的持续努力,朝鲜族文学必将迎来持续繁荣的良好局面。

■创作谈

从桂西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往东13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40公里,在三级公路的对岸,有一个被竹林和青山环抱的村庄,就是上岭。它是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或者摇篮。我16岁以前的全部生活和记忆就在这里。对我来说,家乡是我生活过的地方中最洁净的土地,我最纯真的岁月也是在那里度过的。自从我离开了那里,进入都市,我被各种欲望骚扰、引诱、腐蚀,尽管我努力地进行着抵抗,同时用4部长篇小说对我的都市生活进行批判和解剖。但我还是觉得我已经不天真、不干净了。我要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我为什么变成了现在的我?我能变回去吗?而我认为最纯净的家乡这么多年也在变化着,我的村庄生态越来越好,我的乡亲也变得比以前富裕了,但是欢乐却比以前少了很多。这是为什么?我必须重视这个现状,就像审视我自己一样。

2007年的一天,我回到上岭。此次归来,距离我上次返乡,相隔了11年。这次返乡,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亲切而隔阔的上岭、熟悉而又陌生的乡亲,让我关切和疼痛。从那年以后,我年年回家。期间我还争取到政府的10万元钱给上岭修建了一个码头。殊不知正是因为这10万元,差点造成了众叛亲离的后果,因为我不允许我的亲戚染指这10万元钱,而修建码头的人又没有用好这笔钱,建起的码头差强人意。我被亲戚抱怨,被村民误解——我大哥和大嫂去给承建码头的包工头打工,一天工钱30元,被旁人嘲笑说码头的钱是你弟找的,你却只能在这做苦力。大哥大嫂当即摔掉了扁担。村民因为怀疑修建码头的钱被人贪污,去县里告状,接待的黄副县长问了一句:“你们知道凡一平吗?”当晚堂弟便打电话给我,质问我黄副县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时我没有做任何解释。我依然年年回乡。依然尽我所能为上岭做事——丙申年我又找了20万元,新建了一个码头,并找老板资助了15杆太阳能路灯。从此我的乡亲过河不再趟腿,晚上即使喝醉了也不怕没人发现。

回乡,只要我回乡,似乎这才是我的乡亲所期盼的。如今,只要在每年的某个重要节点,乡亲们总会看到我坦诚的面孔,而他们回报我的,只有热忱。亲善似乎又出现在我的村庄——也是丙申年,我复旦进修时的同宿舍同学徐顺平来到上岭,因为喝得高兴,回到南宁时才发现手机落在了上岭。这位大商人非常担心手机里的秘密泄露。第二天,我堂哥骑着摩托车跑了50公里赶到县城,再乘班车130公里到南宁,把手机交给徐老板。他迫不及待地检查手机、翻阅手机,然后惊叹:“上岭没有斯诺登!”

是的,我的乡亲个个善良。但我还是心情沉重。我沉重的原因是我既往的农村生活和现实的农民命运,总是像磐石一样压迫着我。它压迫了我很多年,无论我在金光大道进城过着似乎很美好的生活,它始终是我挣脱不开的梦魇。忽然有一天,我找到了撬开磐石的杠杆和角度,为此我激动不已,并且不遗余力。

2013年创作出版的《上岭村的谋杀》,是我正视自己生活的土地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使我获得了一次艺术的跨越和心灵的救赎。我写了一部内容与我以往不同的小说。“心灵的救赎”是指我以往的小说总是背离我成长的土地和河流,我愧对我的农村生活。而现在我的笔触调转了方向,我回来了。所以我解放了,得救了。

《上岭村编年史》是我延续“艺术跨越”和“心灵救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其灵感来源于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风水师》。我为这篇6000字的小说居然看了数十万字的包括《黄帝宅经》在内的风水书籍,而更多的是思考人生的荒诞和沉浮,人性、命运的丰富和多变。

《风水师》写完了,我把它投出去,发表在《广西文学》2017年第4期。正值4月清明,我携这本杂志回上岭扫墓。我顽皮的孙辈们从我的包里翻出了这本杂志,连同糖果饼干一起拿走了。这本杂志传来传去,居然传到了樊光良的手上。4月的最后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樊光良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你对我的虚构太多了,我哪懂那么多风水呀。其实真正的风水师是你。如果你敢,你能把上岭村的人都写个遍,我更服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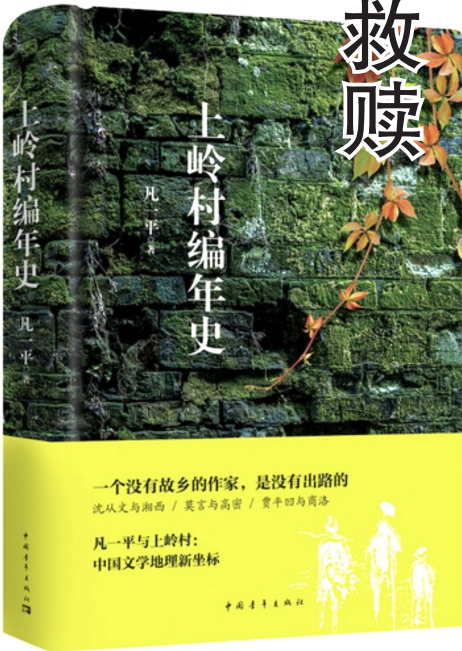
樊光良的话,像巫师的蛊惑怂恿我,也像神灵的昭示指导我。我当即坐到电脑椅上,打开电脑,飞快地写下了小说的第一节。我一发不可收拾,从5月1日凌晨,到7月4日,我居然写完了长篇小说《上岭村编年史》。而且期间我出差、开会、醉酒,至少耗去一个月时间。对我这样一个愚笨的作家来说,这个速度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何况,我对这部小说相当满意。这是我的第7部长篇小说。在我写完第5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会再写了。我可居然又有了第6部、第7部,这多余的两部是谁送我的?是谁在操纵我的手,让我继续写上岭、一定写上岭?

既然如此,那索性就让我写得更多、更超前吧。

《上岭村编年史》·

对我心灵的再一次救赎

□凡一平(壮族)



一个没有故乡的作家,是没有出路的
流从文与湘西 / 莫言和高密 / 曹中马与高唐
凡一平与上岭村:
中国文学地理新坐标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在民间

生生不息的彝族打歌

□字春华(彝族)

在滇西彝族聚居的彝家寨子里,每逢婚嫁、节庆或乔迁新居,彝家人都要以打歌来庆贺。在彝家特殊的日子里,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寒风刺骨,打歌调都会亘古不变地响起,村寨里的男女老少也会不约而同地痴迷地围成圈和歌而舞,直到天微微亮,尽兴而归。

从我记事起,故乡风庆县腰街彝族乡的打歌和打歌调一直没有停歇过,这与故乡的人、事、物都是分不开的。

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岁月里,家乡的人们基本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轨迹,在忙碌的季节里,他们相互帮助,一起跟着耕牛,有节奏地锄地播种,直到一块块土地散发出新鲜的气息。在这个过程中,累了就歇一会儿,聊聊天家常,聊聊庄稼,然后接着干活,直到黄昏才归家。艰辛的劳作让彝家人养成了相互帮助的氛围,同时也更加珍惜那些值得庆贺的节日。打歌这种充满浓烈庆贺和狂欢味道的集体彝家歌舞也就这样生生不息地落了地,开了花,并一直影响着彝乡的一代又一代人。

在婚嫁这样的大喜事里,新郎家是必定要打歌的。过去,由于交通不便,路远的亲朋好友们在新郎家吃完流水席后就留在了新郎家,等着天黑后一起打歌。新郎家也一定会事先到村里的小学里借好汽灯。等天色渐暗,年轻的小伙子们

就开始不断地往汽灯里打气,汽灯一亮,整个场院瞬间就明亮了。这时,老人们或手牵或背着儿孙,带头先开始边打歌边围成圈,拉开打歌的序幕,圈子中间也很快就有了吹笛子或吹芦笙的,演奏者掌控着节奏,伴着清脆悦耳的笛子或芦笙的音调旋律,打歌节奏随之也会整体地时快时慢,旁边看热闹的人们也会陆续地被感染着加入到打歌的狂欢之中。随着加入打歌的人越来越多,打歌的圈子自然也会越围越大,到最热烈的时候,打歌节奏也会越来越欢快,大家的舞步都变成快速的“三翻三转”。

在这样的场合,对歌当然是少不了的了,这是打歌中乡人们最好的交流方式。对歌的内容大多源于生活,通常与男女恋爱和日常劳作总结出的智慧有关。对歌时,都是男方或女方先唱,对方根据内容来有押韵地对唱。对歌时,一般都是男女几人组成一队,边商量对唱内容边整齐对唱。有些对歌是问答式的,在一来一往中,既是智慧的较量,也是情感的交流。每次一方快唱完时,都会加上“阿吾妹回来,阿苏瑟噫着”的调子。在这咏叹调中,生活的琐碎与细节、自然情感的表达与抒发也就融在了其中。

乡人们的打歌调子朴实,同时又富有生活气息、生活哲理。乡人们通过打歌唱尽生活的形形色色。男女青年也会在这难得的场合里尽



情地展现自己的魅力,对着中意的对象自然地唱出最朴素粗犷的对白,唱到的爱情也是最为直白真挚。

通常地,庆贺活动的主人家会在打歌的场院中心摆上水酒,任由乡人们各取所需。讲究的人家,还要请打歌的乡人们进入到家里正屋的中心尽情地唱跳,以祛除一切的邪祟。

在这难得的狂欢聚会中,热闹一直会持续到

天微微亮。就如调子里唱的:“太阳不落打歌去,夜半三更不回家。”打歌就这样陪伴着一代代的彝族人。正如清道光年间大理文人周之烈在《打歌行》中所写的:“癸卯正月刚五日,村农结伴来相过。怜我羁旅夜寂寞,芦笙竹笛齐摩挲。松棚竹火彻宵明,团团围绕偏多情。男倡女和人数十,踏足歌唱同一声。舞之蹈之各中节,新翻曲调如春莺。有时疾,天掀地震山云立;有时徐,轻柔缓带如闲

居。陡而高兮忽而下,鹤韵遥传水深泻。声容两善真莫莫,直抵鸡鸣天色光。我生何晚愿何长,古风犹在山水乡。”

传统的彝家土木结构的屋子,其建盖过程非常复杂。从地基的选定、木料的选取制作,再到房屋中心柱子的竖起、新屋的落成,都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在不同的建屋环节中,也需要乡里乡亲们齐心协力协助。建一个房子,最快也需要半多年的时间,所以乔迁新居的人家都要吃流水席,晚上定要打歌庆贺。

大年初一和正月十五元宵节,家乡都有朝山会。朝山当天,来自四邻八乡的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到山中的一块草地里聚会,除了日常的拉家常外,还有物品的交易,有套圈、打扑克牌等娱乐项目。最重要的,当然是规模宏大的打歌狂欢。即使是在尘土四起的场地上,打歌的人们也会打得亦乐乎、忘乎所以。因为这是一年之中为数不多的在白天进行的打歌。

现在,家乡建起了村级活动场所。每逢节庆,都会有乡里乡亲聚到这里,一起打歌对调。现在,人们经常拿着手机各自玩,互相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变少了,而打歌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聚集在一起。每年回家过年,都会在年关看到多场自发组织的打歌。无论多远多久归来的乡人,在打歌的场合愉快兴奋地聊着,用手机拍着,年轻的男女已经成为打歌的主力,孩童们也学会了打歌的步伐。

在月光照射下的朦胧山峦间,缀满星星的夜空下,打歌牵引着乡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细节、一段段话语,呈现出生活酸甜苦辣的个中滋味。生生不息的打歌,是彝家人生活本质的延续,也是彝家人一代代不会缺失的信仰。